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菴园文录外编	
筹洋刍议	恤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诠	睡的人醒了
强学—戊戌时论选	
民声—辛亥时论选	
新潮—民初时论选	

仁学

谭嗣同集

加润国 选注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学:谭嗣同集/谭嗣同著;加润国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1-5

I. 仁…

Ⅰ. ①谭…②加…

Ⅲ. ①谭嗣同-文集②哲学思想-研究

③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Ⅳ. ①B254.2 ②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7,000 印张:8 $\frac{3}{8}$ 插页:5

印数:1—1,626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 杨

责任校对:吴广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定价:8.7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有一部震聋发聩的大著，在黑暗否塞的封建社会晚期，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喊出了“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思想的最强音，并被作者殷红的鲜血打上了一个浓重而醒目的惊叹号，这就是被誉为“青年斗士”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谭嗣同所撰写的《仁学》。

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东海寰冥氏、华相众生等，湖南浏阳人，于1865年3月10日出生在北京宣武城南懒眠胡同邸第。5岁起读书，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字瓣姜）为师。12岁时堂姐嗣淑患白喉症从广西来北京求治，使前去探视的谭嗣同及其生母徐氏、大哥嗣贻同时染疾。嗣淑、徐氏和嗣贻相继去世，谭嗣同则“假死三日，仍更苏”，其父因此为他取字复生。生母死后，父亲的小妾对他任意打骂和虐待，使他“不得父欢”，“备极孤孽苦”。这种痛苦的经历直接影响了谭嗣同的思想和性格，如他在《仁学序》中所述：“吾自少及壮，

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同年，谭嗣同结识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著名侠客大刀王五，跟他学习单刀和剑术，这更锻炼了他慷慨任侠、桀骜不驯的性格。13岁时，谭嗣同随父回浏阳，结识了唐才常，二人性志相投，同在欧阳中鹄指导下读书，成为“刎颈交”。20岁时，开始为期十年的漫游生活。“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莽。”^①此后的十年，谭嗣同往来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虽然“迫于试事居多，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②却也广涉名山大川名古迹名胜，视察风土，物色豪杰，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其间令他感受最深的是：“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③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成了他后来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精神动力。1894年，谭嗣同迈入而立之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志士，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的危亡改变了谭嗣同的人生道路，他开始从一个矻矻于封建仕途的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他自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

① 谭嗣同诗《陇山》。

② 见谭嗣同《三十自纪》。

③ 见谭嗣同《三十自纪》。

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①他决心告别旧我，走向变革社会的新途程，于是系统地清理了自己过去的著作，辑为《东海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即《寥天一阁文》第一种，《莽苍苍斋诗》第二种，《远遗堂集外文》第三种和《石菊影庐笔识》第四种。其中思想性较强的是《石菊影庐笔识》，包括《学篇》七十六则和《思篇》五十四则。《学篇》主要是读书笔记；《思篇》则以思考问题为主，体现了作者初期的思想状况。

1895年3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广大爱国者的愤慨。康有为趁各省举人齐聚北京应试之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运动的序幕。谭嗣同“乃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维新变法运动中。他认为变法须“以教育贤才为急务”，教学内容以“算学格致”为主^②。他与唐才常等商议在浏阳筹设算学馆，但因迫于父命而不能出面牵头，就给欧阳中鹄写了一封长信，痛陈时势，希望他在浏阳“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欧阳中鹄深表赞同，就把谭嗣同的信略加删减，并加批加跋，刻为《兴算学议》，“以当家喻户晓”。湖南巡抚陈宝箴看到《兴算学议》后，大加赞赏，“命印千本，遍散各书院。”^③这时，唐才常

① 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四期124页。

② 见谭嗣同《兴算学议》。

③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

等主张把县城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拟订了算学馆章程呈示湖南学政江标，得以批示。但因遭到了当时湖南一般封建士大夫和学子及浏阳县官和当地顽固绅士的激烈反对，致使江标的批示无法贯彻。谭嗣同等无可奈何，只好由十六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算学社”。这时，谭嗣同的故友贝元征写来信痛诋洋务，谭嗣同于是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即《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批驳了当时一些人鉴于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覆灭的事实迁怒于向外国学习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只有变法才能挽救危亡的观点，并系统地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这一年谭嗣同31岁，这两封具体提出和讨论变法问题的长信代表了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1896年3月，谭嗣同离开湖南北游访学，“愿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鉴观。”^①他先到上海，会见了英人傅兰雅，并贻西书；然后展转天津，考察了机厂、船坞、火车及煤矿、金矿等近代化设施，最后到了北京。“京居既久，始知所愿皆虚，一无可冀。慨念横目，徒具深悲，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所倚。”^②于是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等佛学家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并加入了在理教，从此倾心于佛学。8月到南京就候补知府，同时跟著名佛学家

① 见谭嗣同《北游访学记》。

② 见谭嗣同《北游访学记》。

杨文会学佛。先是于京师结识梁启超，得以了解康有为及其学说，引起极大兴趣，并由此而生敬佩，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从此，谭嗣同开始认真研究变法的理论问题，酝酿《仁学》的写作。“若夫近日所自治……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①第二年春，《仁学》得以定稿。这两年所写的《北游访学记》和《仁学》，成为谭嗣同启蒙思想的成熟形态。

1897年，谭嗣同从南京到长沙，与陈宝箴、黄遵宪、唐才常等创办时务学堂及矿务局等。1898年春，与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培养人才，同时兼作地方议会。同时创办《湘报》。这些活动遭到了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有人扬言要杀害他，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湘报》停止发行，谭嗣同毫无所惧，坚持活动。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建议，下了定国是诏，学士徐致靖保举谭嗣同。9月，谭嗣同带病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新政，称军机四卿，担任拆阅章奏、起草上谕的工作。13日，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声言“朕位几不保”。谭嗣同主张请新建军督办袁世凯相助，于是深夜探访，约定由袁杀荣禄以除旧党，结果被出卖，慈禧再度训政，光绪遭禁，“六君子”于9月25日被捕。被捕前一日，日本友人劝其东游避难，但谭嗣同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

^① 见谭嗣同《致唐才常》信。

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被捕后题诗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终尚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容就戮。谭嗣同的殉难，是一个思想家有意作出的抉择，是他的仁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他用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其仁学打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

二

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是通过其独特的“仁学”体系呈现的。“仁”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概念，孔子讲“仁心”，孟子讲“仁政”，朱熹讲“仁生”，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仁本”思想。谭嗣同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并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需要，为其注入自由、平等、博爱的新血液，把“仁”改造为他的新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首先，通过对“仁”、“元”、“无”三字的新颖训释，谭嗣同得出了“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②的结论，从而赋予“仁”以世界本原的意义。接着，他对“仁”作出五种规定：（一）“仁以通为第一义”；（二）“智慧生于仁”；（三）“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四）“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五）“不生不灭，仁之体”^③。这使“仁”

① 见梁启超《谭嗣同传》。

② 见谭嗣同《仁学序》。

③ 见谭嗣同《仁学界说》。

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1）仁为宇宙本原：寂然不动，不生不灭，化生智慧，化生万物；（2）仁为认识的基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至转业识而成智慧；（3）仁是维新变法的根据：仁之第一义“通”暗含一个“变”字——《易·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显然，谭嗣同将重点放在了第三方面，即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之相为平等”；“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①。——这正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集中表现。

为了进一步论证“变”这个仁之通义，谭嗣同把西学中的“以太”概念加以独特的改造，引入了仁学体系。他说：“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②所以他要求：“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③什么是以太之体用呢？他在《仁学·一》和《以太说》中作了详细的论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嗅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它虽然无形，却为万形所附丽，虽然无心，却为万心所感应，不生

① 见谭嗣同《仁学界说》。

② 见谭嗣同《仁学界说》。

③ 见谭嗣同《仁学·一》。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仁学》正文，故不另标注。

不灭，化生万物，与仁同体。以太显于用，就是仁，即宇宙本原与本体在人性上的基本表现。所以孔子叫它“仁”，叫它“性”；墨子叫它“兼爱”，佛祖叫它“性海”，叫它“慈悲”；耶稣叫它“灵魂”，叫它“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叫它“爱力”、“吸力”，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即宇宙本原与本体所显现的“用”，也就是他所谓的“仁”。以太概念的引进，是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充实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太概念本身就含有科学启蒙的意味，它不但使谭嗣同的仁学体系获得了坚实的物质论基础，而且使他在充分发挥“变”的思想来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作论证时更加得心应手。

谭嗣同实行维新变法的直接思想基础是“天地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而天地何以会变化日新的哲学根据正是以太本身的辩证性质。他论证说：“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以太之动机，又是怎么具体地造成天地万物的日新变化呢？谭嗣同采用中国易学中独特的“取象类比”的思维方法，巧妙设喻，形象地表达了对立面的同一与斗争导致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含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同有异，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而奔崩轰响发焉。”为了更进一步地论说维新变法的必然性和这场变革所不可避免的摧枯拉朽的革命暴烈性，以及它所具有的变黑暗否

塞为光明通泰的伟大意义，他还大力铺陈渲染，将抽象的变法理论寓于形象的文学意境，对以太之动机所必然引发的自然与社会的变革运动作了充分的展现，他接着写到：“宇宙为之掀鼓，山川为之战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谓暴矣。然而继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风，雾豁天醒，霾敛气苏，霄宇轩昭，大地澄涤，三辰晶英于上，百汇孚甲振奋于下，蛭飞蠕动，雍容任运而自得，因之而时和，因之而年丰，因之而百汇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动，而由之以无极也？斯可谓仁之端也矣！”这段关于仁之体通过辩证运动达到以太之用的仁学境界的生动描绘，不仅体现了谭嗣同作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青年斗士”的思想性格，也透露出他对阶级革命在创造新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的朦胧意识，是谭嗣同启蒙思想的一个可贵的闪光点。

在谭嗣同看来，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就是“变”与“不变”的冲突，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他先论述变与不变的关系：“反乎逝而观，则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夫恶亦至于不日新而止矣。”接着从理论上说明变的必要性：“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穰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然后用现实的危机说明势在必变：“外患深矣，海军燬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

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怎么办呢？“唯变法可以救之！”这就是谭嗣同的结论。

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新与旧、生与死的矛盾是难以用和风细雨方式解决的，没落的东西不可能主动让出历史舞台。谭嗣同认为，变法的主要障碍是反动腐朽的封建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所以他对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种将封建的政治与学术联系起来，揭露其交相资的反动本质的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他指出：“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于是，“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取便以故也”。这就是大盗利用乡愿！其结果，“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于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致使仁义不存，大道不行，天地否塞，人理全无。如此深刻的批判，在谭嗣同的时代是前无古人的。它具有非常重大的启蒙意义，真正为没落反动的封建社会敲响了丧钟。

为了彻底冲破封建伦常与君主专制的重重网罗，谭嗣

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君民契约论和民本君末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累及本者，亦岂有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他还说，君是为人民办事的，臣是助民办事的，“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这种思想，显然已超出了改良主义的范畴，有点像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理论根据了。为了尽早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谭嗣同还提出了十分激进的革命主张：“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还引《周易》中的话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认为“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他要求“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这种大胆的革命思想，直接为继之而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了先声。

谭嗣同的启蒙思想，不是几句简单的反封建和倡变法的口号，也不是局限于某些领域的几种富于启蒙意义的学说，而是一个哲学宇宙观意义上的丰富而深刻的体系。可以说，他的仁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启蒙思想”的体系；而与以太相结合的“仁”，则是经过宇宙观提升的本体化了的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最高表现。当然，谭嗣同的思想也有博杂的一面，如他信奉佛教，相信灵魂不死，夸

大心力的作用，认为中国之大劫将至，“无术以救之，亦惟心以解之，缘劫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等等。这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脱离人民群众，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而他们所鼓吹的大同理想，也只能是一种空想。但这只是白璧微瑕，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并没有掩蔽谭嗣同启蒙思想的耀人光彩，这种光彩使他无可疑义地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巨人！

三

谭嗣同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十多部著作，在他生前只刻印过《东海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和《兴算学议》，其他撰述都是在他死后陆续出版的。《仁学》写成后，曾“示一二同志”，如梁启超、宋恕、章太炎、吴雁舟及唐才常等，但没有公开发表。戊戌政变后，唐才常参加主持《亚东时报》编务，便把他所珍藏的原稿或抄本在该报上连载发表，首刊于1899年1月31日。同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也把他所珍藏的抄本在《清议报》上连载发表，首刊于1899年1月2日。两者在内容上略有差异。后来《国民报》本和另外两种铅字排印本都沿自《清议报》本，但现在一般认为《亚东时报》本更为可靠。1900年，唐才常死难不久，有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浏阳二杰遗文》出版。辛亥革命后，又有《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在长沙出版。后来，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遗集》。另外，上海文明书局也编印了《谭浏阳全集》（后来由群学社改版为